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高丙中 主编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澳〕德里克·弗里曼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澳〕德里克·弗里曼 著

夏循祥 徐 豪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澳)弗里曼著；夏循祥，徐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5660-1

I. 玛… II. ①弗…②夏…③徐… III. 萨摩亚人—民族文化—研究 IV. C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6473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澳〕德里克·弗里曼 著

夏循祥 徐 豪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660-1

2008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4

定价：37.00 元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总 序

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很遗憾,人类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还是很冷清。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培育一个号称“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专业群体。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把呈现“社会事实”作为职业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分工比较细密或者说比较发达的许多国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的精致方法和文体,这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

“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被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

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类学家逐渐积累了记述异民族文化的技巧,把庞杂而散漫的民族志发展为以专门的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我”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

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

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所从出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

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界不可能都由民族志提供社会事实，但是民族志提供的“事”具有怎样的数量、质量和代表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实事求是”的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就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

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

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完整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出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我们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发展起自己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

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相连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

我们对原著的选择主要基于民族志著作在写法上的原创性和学科史上的代表性,再就是考虑民族志文本的精致程度。概括地说,这个“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入选者或是民族志水准的标志性文本,或是反思民族志并促进民族志发展的人类学代表作。民族志最初的范本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等人在实地调查大洋上的岛民之后创建的。我们选了米德的代表作。马

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最重要的开创之作,好在它已经有了中文本。

我们今天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推荐的民族志,当然不限于大洋上的岛民,不限于非洲部落,也不应该限于人类学。我们纳入了社会学家写美国工厂的民族志。我们原来也列入了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写英国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成为工人之现象的民族志著作《学会劳动》,后来因为没有获得版权而留下遗憾。我们利用这个覆盖面要传达的是,中国科学的实地调查研究要走向全球社会,既要进入调查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深入西洋东洋的主要发达国家,再高的成本,对于我们终究能够得到的收益来说都是值得的。

这个译丛着眼于选择有益于磨砺我们找“事”、说“事”的本事的大作,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本事的不足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软肋。关于民族志,关于人类学,可译可读的书很多;好在有很多中文出版社,好在同行中还有多位热心人。组织此类图书的翻译,既不是从我们开始,也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大家互相拾遗补缺吧。

高 丙 中

2006年2月4日立春

谈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代译序)

庄孔韶

在人类学界,关于弗里曼质疑米德的学术论争尽人皆知。其缘起是说米德在她的老师、知名人类学家博厄斯的指导和授意下,于1925年到萨摩亚从事田野工作。她发现,萨摩亚人的生活是从容而无忧无虑的,青春期是其一生中最轻松而快乐的时光;而反观美国和欧洲人的青春期则情绪紧张且带着矛盾心理。这意味着米德带回了来自其他族群的一个鲜明的民族志“反例”,其反例的重要意义存在于一个显而易见的对比性解释结论:青春期的躁动现象是出于文化上的而非生物上的原因。这一惊人结论在1920年代热火朝天的生物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对垒中,有力地支持了强调人类生活中的文化主宰作用的一方。

的确,1928年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之后,该书一直处于人类学教科书及其知识体系的重要位置上,这本书是人类学史上最畅销的田野作品之一,影响了世界上众多读者的思想,在中国也如是。

《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主要发难人德里克·弗里曼曾是米德作品深信不疑的追随者。但他在自己1940—1943年间的萨摩亚调研中发现,米德“关于东萨摩亚的马努阿居民的大部分描述,愈来愈明显地不适用于西萨摩亚”(第10页,本书页码,下同)。这些同源的萨摩亚人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差异?于是弗里曼萌生了追踪和检视米德在萨摩亚期间的田野工作质量及其结论之间的相关性问题的。当弗里曼1943年第一次离开萨摩亚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自己“迟早有一天会直面反驳米德关于萨摩亚的结论的责任感”(第10页)。

弗里曼在田野工作的质量问题上,批评米德对萨摩亚语的学习时间太短,怀疑她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能力,而且米德最终选择了同美属萨摩亚

海军政府的地方代表同住的办法(在萨摩亚人居住地之外),因此,她显然失去了与当地土著发展亲密接触的可能(第 251—252 页)。又,米德在马努阿的调查的时间仅仅 5 个多月,最后几周还大都用来为毕肖普博物馆完成民族学研究,因此,米德计划要进行的关于青春期女孩性行为的“特殊调查”,实际上,根本从未进行(第 6 页)。她没有参加村庄的任何政治活动,也没有机会参加地方的社会仪式(第 69 页)。

按常理来说,外来人在短期交往中就向当地人发问有关性行为的敏感问题,的确会出现“非常尴尬”的景况(第 254 页),于是酿成了米德当年的土著信息提供者在 60 年后手按《圣经》宣誓她们确实曾经面对米德使用了萨摩亚人历史悠久的“塔乌法阿塞”的愚弄伎俩——土著信息提供者的证言在 1989 年载入《美国人类学家》(第 3 页)——米德当年对此信以为真。她被故意地误导了,把信息提供人的不实之词带进了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之中。

不仅如此,弗里曼还质疑了米德的一些重要解释和论断。例如,他认为米德描绘的萨摩亚人显然是擅于合作的,在他们的社会中,竞争被弱化了并且得到了控制(第 128 页),而弗里曼则认为,在以统治和等级为基础的社会习俗下,萨摩亚人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民族(第 139 页)。在萨摩亚人的基督教信仰背后,仍然存在着这种原始的等级制度及其所导致的对立冲突和紧张关系(第 239 页)。对于那些违反基本社会要求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会受到惩罚(第 168 页)。

米德提及萨摩亚青少年都期待自由的性爱,通奸并不被视为“非常严重的事情”,^①而弗里曼则认为“通奸”在萨摩亚人中仍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第 212 页)。他还以数据清楚地表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远不像米德所断言的那样“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是“最轻松安逸的时期”,而是事实上与美国、英格兰和澳大利亚的情况相同,是一个青少年犯罪发生率比人生其他任何阶段都更为频繁的时期(第 233—235 页)。所以,米德在《萨摩亚人的

① Margaret Mead, 1973.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p90.

成年》一书中依据这些错误描述而提出的“文化因素相对于生物因素所占据的决定地位”的论断显然是无效的。同样,米德关于生物因素对萨摩亚青少年的行为并无多大影响的陈述,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米德的萨摩亚“反例”也根本不成其为反例(第 235 页)。

弗里曼还批评米德的导师博厄斯没有很好地指导米德阅读那些很容易得到的关于萨摩亚的多种民族志文献,因为里面早已写到萨摩亚人的行为方式,当然也包括性行为——它们和米德对马努阿人生活的描写大相径庭(第 255 页)。因此,弗里曼针对米德知识结构及思想渊源的追索研究,论证了她为了维护博厄斯学派的学说,驳倒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而对萨摩亚那些与其信念相反的证据视而不见(第 247—248 页)。为此,弗里曼是将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当作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指出其教训在于“当为一个珍爱的学说寻找证据时,那些相关人物所深深持有的信念将会不知不觉地把他们送进错误的牢笼”(第 256 页)。弗里曼还以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体会到,文化人类学家不可能忽视人类心理状态中“属于基本遗传的那一部分”(第 260 页)。而恰当的理解应是:我们可以据此将生物决定论看做是初始理论,而将文化决定论看做是反理论。那末,将它们进行一个学术性综合,对人类学和生物学二者来说,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第 264 页)。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是弗里曼这一著作(1983 年首版)的重版译本,增加了新版的序言。在这篇新的 1996 年的作者序中,我们看到弗里曼在初版著作发表四年以后,是怎样找到了米德在 1926 年结识的萨摩亚信息提供者及其做证使用“塔乌法阿塞”的愚弄伎俩的情节,这当然对米德来讲是很不幸的背景陈述。我们看到弗里曼对米德田野点的追踪和多次回访研究,几乎花费了他的大半生的经历。首次是从 1940 年到 1943 年(对伊班人的研究一度耽搁了弗里曼的萨摩亚追访),几乎 20 年后,1965 年他再次返回萨摩亚,做了两年的田野研究,随后是 1981 年,他带着评价自己作品草稿的目的三访萨摩亚。他在澳、新、英格兰和美国的图书馆的研究时间更为漫长,以致我们看到弗里曼大约有 40 多年的断断续续的调研,始终围绕着萨摩亚人和米德,其学术追求可谓执着、持久与认真,其所涉猎的视角远远超出萨摩亚

人青春期的主题范围。因为我们很清楚,关于一个问题的驳论的研究基础远远超出一个问题本身。因此,人们总是提醒,当过于片面地强调“问题意识”的时候,谨防忽略那些有着各种影响力的、围绕该问题的多元视角及其过程。显然,为了保持田野研究的学术质量,研究者基础的语言条件、背景资料研读及理论掌握均十分重要。说到理论,当然需要谨防那些理念先在的印证性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所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并不错误,然而往往是无效的。

对弗里曼—米德之争加以评估的困难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一争论本身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人们首先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萨摩亚人的居住地变化很大,偏重过去的论题又不得不跨越时空加以审视。然而,并不完全如此。在这场人类学史上著名的学术争论(越出学术界而见诸美国各大报章)中,影响性因素显然并不单纯。^① 就算是一些较为中庸和缓的评论也带有影响性的烙印。例如,在美国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写道:“从比较的方法看,萨摩亚人的性行为并非如米德或弗里曼描绘得那样偏激,在世界上众多文明中,萨摩亚人并不像米德所认为的那样的性放纵,也不像弗里曼所认为的那样受限制。当然,萨摩亚人对性行为所持的态度是处于性自由和性压抑的中间状态。弗里曼关于萨摩亚人比其他文化中的人更具保持童贞态度的偏激说法未能得到跨文化研究的支持。”^② 然而,“弗里曼的贡献在于他对这种公共道德制约的描述以及因羞涩和与性行为相联系的危险而导致了秘密性行为”的解释。弗里曼指责“米德忽视生物性而强调文化的观点是一种误导”,而实际上“弗里曼关于生物性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假设,米德本人也接受。”^③

围绕弗里曼和米德争论及其评论涉及的问题和因素极为复杂,如田野工作的质量、立论的根据和结论过程、可验证的和不可验证的、撰写的可信

① 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58—460页。

② Paul Shankman. 1996. Mead-Freeman Controversy, *Encyclopedia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edited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A Henry Holt Reference Boo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Vol. 3, pp. 757—759.

③ 出处同上。

度、时空关系、社会变迁的速率与向度、大学者的声誉、学术霸权与回应、对初访与回访动机的理解等；此外，还关涉人类学者及其评论者的国别、族群、文化、区域学术圈层认同，以及历史渊源等。弗里曼和米德的学术争论并没有唯一的结论，然而我们从中引申出的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意图或用心之臆测，而是人类学者在思考上述多元干涉性因素之时如何把握学术评估的尺度，不断改善人类学从参与观察到撰写的整个进程，实在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分别阅读米德和弗里曼的代表作品之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结论，这是一个人人学习、人人评价的过程。我们或许已经能够说出他们谁在何种问题上正误的断言，或许有时又难以说出，然而我们必须鼓励学术质疑的思想与行动，因为这是学术良性发展的有效的调节剂。

我们一直关心“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不同代际学者之间的回访研究的关系，这既包括一些特定问题受到质疑的学术联系问题，也涉及学者私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学术史上的论题之争能够同私人关系和谐共存，实在是可见而并不一定多见的情形。幸好1964年弗里曼在米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得以促成一次难得的会晤，当时弗里曼表达了他对米德在萨摩亚研究中得出的普遍性结论的反对立场，并且表示“不会引起他们之间任何不好的感情”。弗里曼在1964—1978年一直保持和米德的通信，尽管弗里曼和米德的往返私人信函没有被和盘托出，但从有限的信函字句中仍可发现二人的严谨风格。他们或者激烈捍卫自身观点，或者不为求体面而对真理进行折中，然而二人在激烈的交手之中，似乎均赞同是为了一门“由众多心智而积累起来的科学”而努力（第14页），因此，极为难能可贵。

百余年来，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国内外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也渐渐多起来，相信今后这类回访研究会更多，因为数代人类学家走过的田野点不计其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经历过一个和多个巨大社会变故地点的回访工作，似乎更具有一些特定的意义。^① 首先，回访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对于回访，哪怕是带有索隐钩沉的兴趣也不足以指责，因为只要是一份学术的事业，兴趣、情感依托

① 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第490—493页。

和获得学术成就感并不相互抵牾。的确,回访可以在一些可能的问题上完成前者学术失误的订正,但验证的动机不应是唯一的。因此,回访不能只限于以今日之知识批评昨日之知识,而是在新知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

在同一调查点上开展跨越时空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个社区过程的诸多意义。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

然而,回访的作品面临文字的选择与回应,其中,学术中心圈与学术边缘人的立场选择将影响跨时空的观察及其表达,这是学人难于逃脱的立场,这显然也包括米德与弗里曼,以及包括世界各地评论人对弗里曼—米德之争的态度与观点选择上面。

谨祝贺《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中文新译本面世,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弗里曼—米德学术之争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方便,帮助人类学家和有兴趣的读者深入研读,以充分理解关于萨摩亚人的两位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及结论过程。

二零零八年七月五日

于北京世纪城“乐善堂”

献 给

戴维·威廉森

目 录

1996 年序:米德的萨摩亚	1
第一版序言	8

I 文化决定论的兴起

第一章 高尔顿、优生学和生物决定论	17
第二章 博厄斯与文化和遗传之间的分歧	29
第三章 文化决定论的兴起	40
第四章 博厄斯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52

II 米德的萨摩亚研究

第五章 米德给了博厄斯一个绝对的答案	65
第六章 米德对萨摩亚人的描述	79
第七章 神话的成形	90

III 对米德结论的反驳

第八章 米德研究的历史背景	105
第九章 等级	120
第十章 合作与竞争	128
第十一章 攻击行为和战争	141
第十二章 异教和基督教	155
第十三章 惩罚	169
第十四章 孩子的抚养	176
第十五章 萨摩亚人的性格	186
第十六章 性道德和性行为	198

第十七章 青春期	222
第十八章 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	236

IV 米德与博厄斯范式

第十九章 米德对萨摩亚的误读	247
第二十章 迈向一个更为科学的人类学范式	258

注释	265
拼字和发音注释	304
萨摩亚语词汇	305
致谢	307
索引	310